

書 評 Reviews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Edited by Paul Jakov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ix + 528.

袁 劍*

Email: rucyuanjian@hotmail.com

宋元明歷史與清代變局——順延抑或躍變？

縱觀整個中國史，我們會注意到，中國歷史中的全局性社會、經濟與文化問題在鴉片戰爭之後的清朝徹底暴露出來，近代中國人在西方民主共和的理念下前赴後繼地找尋療救之道。但是，這些問題很多並不生發於清朝，而是在之前的數個朝代就已經顯現並繼續擴大，清朝後期的經歷只是整個中國歷史機體中的潰瘍爆發。故而，要理解清代所發生的諸多事件，就必須對之前的宋元明時代作通盤考慮。由史樂民（Paul Jakov Smith）和萬志英（Richard von Glahn）主編的《中國歷史上的宋元明轉型》（*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一書就是基於這種考慮的嘗試。

本書的主要內容包括萬志英的長篇導論〈宋元明轉型的問題〉（Introduction: Problematizing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以及十篇論文¹，此外還有注釋部分（包括章節附註、徵引書目以及索引）。正如

* 德國弗萊堡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¹ 分別為 1. Richard von Glahn, *Imagining Pre-modern China*; 2. Paul Jakov Smith, *Impressions of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The Evidence from Biji Memoirs*; 3. John W. Dardess,

編者在導論中所稱的，本書試圖找到唐宋時期與明代中葉至清朝時期的某種聯繫，而前述的兩個時期在政治、經濟與思想文化方面都有著各自深刻的轉變，而大多數的歷史學家卻往往忽視了蒙元時期在唐宋與明清之間的橋樑作用，缺乏對蒙元這種橋樑作用的認識，我們對唐宋與明清兩階段本身的認識也就會顯得支離破碎。通過將蒙元時代填入唐宋與明清之間的認識鴻溝，我們就能更為清晰地觀察到中國歷史的較為清晰的流變並注意到唐宋與明清兩個階段之間的相互承接的幾個層面或維度，可以說，將宋元明綜合為一個歷史流變的階段，則正可以為清代變局找到一種合理有效的解釋路徑：我們不僅僅孤立地關注唐宋變革或者明清變革，而且還觀察到宋元明轉變中蘊含的前近代與近代因素。編者在導論中列舉了幾個中心問題：其一，唐宋與明清是何種轉變？其二，作為江南發展週期的宋元明轉型；其三，對江南發展週期的分析；其四，宋元明轉型中的國家（state）與地方精英；最後是對從宋元明轉型至盛清的總結。由於本書已有若干書評²，故而筆者在此將不再詳述各篇論文的具體內容，而是就筆者所感興趣的宋元明轉變與清朝變局的相關問題作進一步的闡述。

Did the Mongols Matter? Territory, Power, and the Intelligentsia in China from the Northern Song to the Early Ming; 4. Li Bozhong, Was There a 'Fourteenth-Century Turning Point'? Population, Land, Technology, and Farm Management; 5. Richard von Glahn, Towns and Temples: Urban Growth and Decline in the Yangzi Delta, 1100-1400; 6. Bettine Birge, Women and Confucianism from Song to Ming: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atrilineality; 7. Peter K. Bol, Neo-Confucianism and Local Society, Twelfth to Sixteenth Century: A Case Study; 8. Licille Chia, *Mashaben*: Commercial Publishing in Jianyang from the Song to the Ming; 9. Stephen H. West, Text and Ideology: Ming Editors and Northern Drama; 10. Angela Ki-che Leung, Medical Learning from the Song to the Ming.

² 筆者所見的有羅禕楠 Luo Yinan 發表於鄧小南 Deng Xiaonan、榮新江 Rong Xinjiang 主編，《唐研究》[*Tang Yanjiu*] 卷 11[vol. 11]以及王一樵 Wang Yiqiao 發表於北京大學歷史系「往復論壇」Wangfu luntan 上的兩篇書評，有興趣的讀者可一併參看。

萬志英在其中分析了伊懋可 (Mark Elvin)、赫若貝 (Robert M. Hartwell)、內藤湖南等人在唐宋轉變問題上的觀念³並進而述及了明清史學界對明清變革問題的相關討論⁴，隨後提出了將宋 (特別是南宋)、元、明三者承繼起來加以貫通性研究的觀點，即約 1100-1500 年這四百年的獨特轉變時期。論文集之所以選取江南地區作為探究宋元明轉型的主要地域，乃是基於其在這一時段內較為穩定的社會環境以及所形成的社會發展的連續性，書中的數篇論文都以這個地域加以展開，如李伯重 (Li Bozhong) 先生的論文即將宋元明時期視作整個江南社會的穩定發展時期，並認為這種發展超越了所謂的「十四世紀轉捩點」 (fourteenth-century turning point)。萬志英的文章對 1100-1400 年間江南地區的市鎮興衰作了探究，並注意到了宗教在市鎮經濟社會結構型塑上的重要意義。筆者認為，江南地區在清代之前的宋元明時期所經歷的社會變遷對社會結構所產生的影響要大於清代對這一社會結構的型塑力量，清朝所謂的承襲明制，在某種程度上是承襲了「宋元明轉型期」的特質。

國家 (state) 問題在宋元明轉型中凸顯出來，從作為相當接近於近代民族國家 (nation-state) 的宋朝 (尤其是南宋) 到具有世界性帝國規模的蒙古—元朝，再到漢人主政的傳統王朝——明朝，國家形態歷經了類民族國家—多族群大帝國—多族群內斂國家的流變，而到清代則再次外拓為一個多族群大帝國。在所具的國家形態背景下，各朝的政治精英在國家權力體系的運作方式亦各具特色。北宋王安石改革中的「富國強兵」政策體現著類似近代民族國家的國內政策，而南宋士大夫的行為方

³ 對唐宋變革問題的解釋模式的總體概括可參見羅禕楠 Luo Yinan, 〈模式及其變遷——史學史視野中的唐宋變革問題〉“Moshi jiqi bianqian: shixueshi shiye zhong de Tang Song biange wenti”, 《學燈》 [Xuedeng] 期 1[no. 1] (2007 年 3 月), 引自 http://www.guoxue.com/magazine/xuedeng/xd001/xd001_11.htm, 2009 年 3 月 10 日擷取資料。

⁴ 以羅威廉 (William Rowe) 以及羅友枝 (Evelyn Rawski) 為代表。

式較之北宋更為內斂，也更具地方性。而之後南宋的敗亡及蒙元大帝國的形成，則打亂了宋朝既有的精英體系，並重新確立起按照族群加以劃分的新的社會地位結構，科舉制度影響力的低落使核心中國地域的精英們始終無法進入元朝政治中心，也無以型塑起他們對元朝統治的穩固認同，元末朱元璋以「驅除胡虜，恢復中原」的極具漢族族群號召力的政治口號將蒙元勢力推回到長城之外並重新確立起相當純化的漢族精英結構。正如達第斯（John W. Dardess）所指出的，元朝的建立徹底改變了之前存在了數世紀之久的東亞多國體系（multistate system）並代之以一個統一的大帝國，之後的明朝則繼承了這種統一格局，但卻劃分出了核心與邊緣區域，而這對之後清朝的藩屬—宗藩制度作了鋪墊。在從元朝至明朝的過程中，明朝初年的政權表現出一種強烈的進取性，而與此同時，元朝政治本身則成為一個負面性的形象，當然，元朝本身對明朝的政治型構也並非沒有建設性意義，元朝為明朝形塑了一種軍事支撐國家穩定的先例，並一直影響到之後的清朝甚至近現代中國，元朝首次開始以包括宗教在內的多種方式管制龐大帝國，而這也為明朝和之後的清朝所延續，元朝的蒙古化權力思維以及無所限制的專制制度也為明清提供了一個與宋朝的君與臣共治天下的分權體制迥異的權力模式，並在大陸地區一直影響至今。筆者甚至認為，蒙古—元朝在宋元明轉型中所體現的蒙古化行為方式還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中俄（俄國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金帳汗國的蒙古化行為方式）在近現代世界歷史中的相似走向。以前我們往往將元朝的歷史忽略了，但在事實上，它對之後的明—清政策走向打下了深深烙印，清朝的很多制度是對元朝制度的反思性創新。從國家型構的角度上講，元朝在承接宋代和明代的國家化意義上較之「唐宋變革」和「明清變革」具有更大的探究空間。

史樂民在導論的總結中將清朝尤其是盛清時期看作是十二世紀以來中國歷史傳統的一個縮影。清朝作為一個發源於中國東北的少數族群建立起的新王朝，在型塑知識份子對王朝的合法性認同與忠誠觀念上較之

蒙元要成功得多，而且其對邊疆地區的控制程度也要強於蒙元（就控制穩固度而言）和明朝（就控制地域的廣度而言），將東北、蒙古、新疆地區（在某種程度上還加上西藏地區）納入官方輿圖，從而形成了西方學者所謂的「清朝帝國主義」（Qing imperialism）。儘管清朝在十九世紀無法解決人口過剩、資源衰竭以及西方帝國主義侵入的問題，但是從長遠來看，它成功地且獨一無二地解決了諸如邊疆族群問題等後一個千年中國歷史所經常面對的問題，而這種現象只有在將之置於整個宋—元—明轉型的背景中方能加以清晰理解。⁵

當然，本論文集也並非全然解決了編者在導論中所提出的諸多問題。正如蕭啟慶先生所指出的：「書中各位作者達致的共識顯然不多。編者之一的萬志英僅列出下列幾點：蒙元統治對中國歷史發展所造成的危害不大，明初種種造成更大的斷裂；江南興起而成為中國的經濟文化重心；道學政治社會觀的制度化。就整體發展而言，編者只能說：這一時期不是唐宋變革與晚期帝國之間的一道裂縫，而是一個過渡以及具有長程連接性動力的顯著階段。這本論文雖然盛義頗多，但對這四百年在中國歷史發展上的地位仍未明言，而且對征服王朝及北方社會注意不足，可以探討的空間仍多。」⁶在某種程度上，「金、元等征服王朝的介入確實對中國近世經濟社會發展造成負面的影響。經濟、人口的逆退及南北不平衡的擴大是金、元統治的後果。在社會方面，金、元統治不僅

⁵ 目前中國大陸地區所進行的新修清史工程似乎尚未能注意到宋元明轉型期對清代政治文化等的總體性影響，筆者認為，要探究清朝歷史的真正內涵，就必須將線索的源頭前推至整個宋元明轉型期的宋代，經歷元代的蒙古化洗禮、明代的集權化和制度的慣性化，方能更好地理解清代制度本身。

⁶ 見蕭啟慶 Xiao Qiqing, 〈中國近世前期南北發展的歧異與統合——以南宋金元時期的經濟社會文化為中心〉“Zhongguo jinshi qianqi nanbei fazhan de qiyi yu tonghe——yi Nan Song Jin Yuan shiqi de jingji shehui wenhua wei zhongxin”一文，2005年12月發表於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近世中國的社會與文化（960-1800）」[Jinshi Zhongguo de shehui yu wenhua (960-1800)] 國際學術研討會。

造成中古、近世質素並陳的現象，也擴大了南、北區域社會的差異。在文化方面，雖然金朝的士人文化比較接近於中古學風，但是元朝的統一導致南北文化的統合，士人文化與民間文化皆在『唐宋變革』的基礎上繼續發展。中原文化自有其堅韌生命力，其發展主線未因征服王朝的介入而改變。」⁷而且，文集也未能對邊疆社會對中原所產生的巨大影響以及宋元明轉型期中的邊疆觀的流變情況加以必要的關注，而這對於系統理解宋—元—明—清的疆域盈縮與王朝性格是極為關鍵的。⁸但總體來說，本文集首次將宋元明時期作為一個特定轉型期提出並系統加以論述，對於傳統的「唐宋變革」與「明清變革」之間的整合具有指標性意義。

宏觀歷史進程與歷史分期問題總是歷史學界最富魅力的主題之一，在法國史學大師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系統性地提出了長時段、中時段和短時段的概念之後，中國史研究對之加以回應並作出自己的型構嘗試也顯得頗為理所當然，但是，其目的則是相當中國化的，即我們以之能更好地理解中國歷史本身。宋元明歷史與清代變局的相互關係問題，也是此中應有之義。

⁷ 蕭啟慶 Xiao Qiqing，〈中國近世前期南北發展的歧異與統合——以南宋金元時期的經濟社會文化為中心〉“Zhongguo jinshi qianqi nanbei fazhan de qiyi yu tonghe——yi Nan Song Jin Yuan shiqi de jingji shehui wenhua wei zhongxin”。

⁸ 在筆者未發表的論文〈從遊牧社會發現歷史——以 11-13 世紀蒙元對漢蒙民族的影響為例〉“Cong youmu shehui faxian lishi——yi shiyi zhi shisan shiji mengyuan dui hanmeng minzu de yingxiang weili”中從遊牧社會的角度對蒙元時期族群政策對宋元明轉型中的國家型構以及之後明清兩朝的族群關係的影響作了探究，從中闡發了筆者對「從遊牧社會發現中國歷史」的研究路徑，本論文集在某種意義上過於集中於對核心中國區域的探究（當然也有其本身的意圖），而忽視了邊疆社會在此一過程中所起的作用。

徵引文獻

近人編輯、論著

袁劍 Yuan Jian, 〈從遊牧社會發現歷史——以 11-13 世紀蒙元對漢蒙民族的影響為例〉“Cong youmu shehui faxian lishi——yi shiyi zhi shisan shiji mengyuan dui hanmeng minzu de yingxiang weili”, 未刊稿。

蕭啟慶 Xiao Qiqing, 〈中國近世前期南北發展的歧異與統合——以南宋金元時期的經濟社會文化為中心〉“Zhongguo jinshi qianqi nanbei fazhan de qiyi yu tonghe——yi Nan Song Jin Yuan shiqi de jingji shehui wenhua wei zhongxin”, 2005 年 12 月發表於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近世中國的社會與文化（960-1800）」[Jinshi Zhongguo de shehui yu wenhua (960-1800)]國際學術研討會，未刊稿。

羅禕楠 Luo Yinan, 〈模式及其變遷——史學史視野中的唐宋變革問題〉“Moshi jiqi bianqian: shixueshi shiye zhong de Tang Song biange wenti”, 《學燈》[Xuedeng] 期 1[no. 1], 2007 年 3 月，引自 http://www.guoxue.com/magazine/xuedeng/xd001/xd001_11.htm，2009 年 3 月 10 日擷取資料。

中央大學人文學報 第三十八期